

# 從不平等公民到數位治理技術： 人文學者看到的動態知識地圖

劉紀蕙\*

## 一、研究的路徑曲折而持續

我的學術背景原本是十九世紀英美文學，然後擴及比較文學與跨藝術研究。但是，我一直認為學術思考不應侷限於單一學科的規範。人文研究者不應該以學科領域來定義自己的研究問題與思考路徑，更不應依循既有成規與公式，而重複生產補充性的答案。世界隨時發生劇烈變化，人文研究者也應該回應這些變化與衝擊，並且以自身面對的難題，發展研究，規劃計畫，尋找答案，並提出新知識與新觀念。因此，我將我的研究定位為跨領域的文化研究，隨著我的問題意識發展研究計畫，接受不同學科的挑戰。

然而，何謂難題？

難題出現於眼前所面對的現象與過去所習得的知識之間發生了衝突，扞格不入，而必須尋求令自己滿意的答案。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知識必然隨之出現。

過去四十年來，我集中思考臺灣與中國糾纏不清的心態史問題，而先後完成了《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症狀式閱讀》(2000)、《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2004)、《心之拓樸：1895 事件後的倫理重構》(2011)、《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哲學考掘學》(2020) 四部曲，並且以《心態史拓撲學：如何面對當代？如何理解歷史？》(2022) 作為方法論的總結。

然而，最近二十多年來，自我從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轉任到陽明交通大學，在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以及亞際文化研究學程任職，便開始接觸大量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生。我的學生除了臺灣、香港、中國之外，還有來自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印度、義大利、比利時、捷克、巴勒斯坦、約旦、烏茲別克、烏克蘭、南非、剛果、多哥、海地等地。由於我的授課原則受到了巴

---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研究員

西教育學家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批判教育學的啟發，強調鼓勵學生的研究計畫必須首先開始於他們對於自身社會難題的自覺意識，並且從問題出發，尋找答案。因此，我開始以政治—倫理—美學為軸心，配合學生的需求設計課程，跟著學生思考他們國家的社會衝突、歷史背景與政治處境，一起閱讀政治哲學、地緣歷史與批判理論。二十五年來，我指導了五十餘篇碩士論文，二十餘篇博士論文，手邊還有十幾篇進行中的論文。當然，這些學生的問題也都是我自己關心的問題，但是，隨著學生的問題，我也拓展了自己的思考空間。

## 二、為什麼在一國之內，法律之前並不是人人平等？

這些課程經驗導引我朝向「衝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的議題，於 2018 年開始了教育部所資助的五年期整合型（2018-2022）的研究計畫，並且邀請國內外研究員與研究生加入計畫。我們結合了政治哲學、人類學、社會學、傳播學、文學、藝術、歷史等不同領域的學者，以跨領域的視野，共同探討當前世界不同形式的衝突所導致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並且思考如何進行思想解殖。

什麼衝突？衝突總是涉及不均衡的權力與利益，並且是在法律保障之下而造成不同的邊界劃分與壓迫性關係，例如性別、族群、貧富、膚色、種族、工作等等。

以我個人而言，我提出的根本問題是：為什麼在一國之內，法律之前並不是人人平等？

延伸的一系列問題則是：

- 為什麼公民政治是不必尊重基本人權的藉口？
- 為什麼公民意識形態可以讓守法的老百姓，以殘酷或是漠然的心態，奴役非公民，例如臺灣的外籍移工，包括遠洋漁工、工廠工人、農場工人以及家庭看護？
- 為什麼法律容許各種法外空間，而讓不同形式的殘酷行為得以存在？
- 擁有大量資本的「公民」，以發展產業為名，經營超級遠洋漁業，透過合法方式，購買巴拿馬、萬那杜、馬紹爾群島、馬爾他、賴比瑞亞等小國的權宜船旗（FOC），而在其所擁有被稱呼為「境外領土」的無數船隻上，以低廉的工資，強迫漁工非法捕撈，一天高達 16-20 小時的超時工作，扣押證件與薪資，甚至以肢體虐待。這些如同奴隸制度的強迫勞動，為何臺灣政府無法究責或是不願意究責？

這些問題顯然並不僅侷限於臺灣。我接觸到的不同學生與不同國家的政治與歷史，讓我意識到國家可以在憲法之下區分不同等級的公民，或是決定部分人口為非公民，剝奪其平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甚至否定其基本人權，而進行殲滅，或是驅逐出境，而造成無數難民、無國籍人士，以及移動勞工。然而，賦予國家權力制定憲法的人，並不代表全體的人民。

東南亞與南亞大部分國家，在漫長歷史中，是大量移動人群往來貿易並且共居的空間，卻在殖民治理劃分疆域之下，成為了不同國的人。獨立建國之後，也出現依照種族而區分公民權利等級的公民政治。緬甸長期系統性迫害生活在當地數百年的羅興亞人，便是明顯的例子。柬埔寨剝奪境內居住數代的越裔人口，使其成為無國籍者，無法取得土地產權，而多半棲居於洞里薩湖的水上村莊。越南剝奪歷代居住於境內的下高棉人（Khmer Krom），使其無法享有平等的語言、教育、宗教、文化、土地與社會參與的權利。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同樣處於被排擠的邊緣位置，而在莫迪政府之下，被歧視的情況日益嚴峻。泰國的山地部落大量人口無法取得國籍。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的原住民或是少數民族，也都處於無法平等享有公民權的邊緣處境。

我們不得不問，戰爭的暴力與制度的暴力，何者更為殘酷？以文明體制以及法律保障所完成的剝削，是否比較不殘酷？維持法律保障的文明體制，是在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中完成的？是否是朝向戰爭合理化的前驅？面對這種支撐現實狀況的體制，我們要如何進行思想上的解殖？如何披露這些不斷生產與複製的意識形態與制度？

### 三、二十一世紀的治理技術發生了什麼改變？

在上述問題以及研究計畫發展之下，我完成了幾篇論文，同時也注意到了在快速發展的數位科技之下，上述問題更加迫切，但是，背後的構成因素與邏輯卻發生了變化。我開始問自己，二十一世紀的治理技術發生了什麼改變？

這個問題顯然受到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的刺激。短短二十年間，我們目睹了中國崛起所帶動的「一帶一路」計畫，從陸地絲路到海上絲路與數位絲路，展開了新型態的空間秩序爭奪之勢，也出現了明顯的國際局勢變化：亞洲地區地緣政治經濟關係重組，美中對峙關係劇烈尖銳化，各地戰爭危機升高。這些發展中的趨勢，再加上數位科技與人工智慧快速升級，並且介入政治治理技術，主導資本市場流動，更加速了人口移動，以及邊緣化人民與不平等公民困境的激化，以及發展主義造成生態危機與環境不正義。

這些問題都促使我繼續組織的第二個教育部五年計畫：「衝突、正義、解殖：21 世紀變化中的亞洲」(2023-2027)。

我認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晶片戰爭」或是「關稅戰爭」，具體透露了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之後造成的國際政治板塊的移動。「晶片戰爭」所反映的現象，並不僅只是美中之間的科技競爭、貿易戰爭與新型態冷戰對峙，而呈現了不同於二十世紀的戰略部署，也改變了全球治理以及資本操作的模式，更展現了新的世界秩序。

「晶片」所以居於核心的原因是，其重要性已經等同於或是更勝於過去的石油。晶片執行多種功能，包括運算、計算、設計、差異化、文件處理、記憶、執行與自動化，是所有人工智慧科技的基礎。無論是 5G 通訊、雲端運算、人工智慧、物聯網、或是自動駕駛汽車，各種行業的數位轉型都大量依賴高效能的晶片。更重要的是，數位科技也快速帶動了不同面向的部署轉型；無論是海底光纜、無線網路、數據中心等基礎設施，都牽涉了經濟與軍事的競爭。半導體技術在各種軍事系統與國家安全中快速地取代了傳統戰爭模式，除了無人機、網路攻擊、基礎設施攻擊之外，更可以進行數位技術封鎖與制裁、數位貨幣壟斷、自動化戰爭、資訊戰、數據武器化、5G 技術壟斷等等。

這些變化，都值得人文學者觀察，並且思考二十一世紀的治理術發生了什麼根本的變化。

#### 四、數位科技深化治理技術

以中國 2013 年啟動的「一帶一路」為例。中國透過「一帶一路」計畫，展開了多方位的全球網絡。截至 2024 年 3 月，已經有 152 個國家和 32 個國際組織，簽署了 3,000 多個「一帶一路」合作項目。

中國約有 95% 的國際貿易採取海線，因此「海上絲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一環。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逐步掌握咽喉點，替代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殖民擴張控權，展現了中國介入全球經濟貿易版圖的二十一世紀戰略地圖規劃。<sup>1</sup>

---

<sup>1</sup> 由中國企業建造的港口有 62 個，中國企業擁有並且經營的港口有 54 個，總數為 116 個海外港口。156 個中國海外特殊經濟區或是海外經濟貿易合作區中，139 個座落於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協議書的國家中。

另外一個快速發展的現象，是「數位絲路」帶動的智慧城市以及數位監視技術。<sup>2</sup> 中共於 2019 年執行「天網計畫」(Skynet)，所謂「雪亮工程」，全國三分之一的縣市都設置了監控設備。<sup>3</sup> 海康威視從輝達公司 (Nvidia) 購買了可編程晶片，可以訓練人工智慧演算法。2022 年，中國啟動了「全球安全倡議」(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利用海康威視 (Hikvision) 和大華科技 (Dahua Technology) 提供的面部識別系統、監控攝像頭、人工智能分析系統，應用於交通樞紐、公共場所以及邊境地區的安全檢查系統。由中國杭州海康威視開發的監視器，甚至可以進行種族化的臉部辨識，而針對新疆維吾爾族人或是境外異議分子進行監視。2019 年，海康威視銷售超過 150 個國家。不少觀察家指出，中國正在輸出威權主義。

中國也協助培訓各國警察，使得當地警察接受培訓之後，可以熟練操作數位監控設備，並共享數據。<sup>4</sup> 中國在全球各國設置了海外警務站，海外 110，「數位天下、天涯若比鄰」，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已經有 102 個據點，監視海外流亡者或是異議人士，並強行執法，所謂的長臂管轄權 (Long-arm jurisdiction)。

## 五、我們要問：在晶片產業與數位科技主導的二十一世紀，除了治理技術發生了變化，世界秩序是否也已經轉型？

傅柯在《安全、領土、人口》([1977-1978]2009) 一書中，針對「治理性」提出了經典性的定義：治理性意味著對於事物的最佳部署，以便經營大量的財富，提供足夠的生活資源。治理不是強制執行法律，而是策略性地使用法律，安排事物，以達到特定目的。

<sup>2</sup> 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趙磊的說法，「一帶一路」2013-2023 十年經驗，目前不僅要「走出去」，還要「走進去，走上去」。解決技術上「卡脖子」的問題，讓世人接受中國企業的文化價值。除了將基礎建設的「硬聯通」假設好之外，還要有規則標準的「軟聯通」作為支撐，加上共建國家的「心聯通」，積極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包括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興基礎建設，以及綠色絲綢之路與健康絲綢之路。2017 年中國啟動的數位絲路積極發展大數據、雲端運算以及智慧城市。華為、海康威視 (Hikvision) 以及大華科技 (Dahua Technology)，在全球生產占全球總量 40% 的監視器，提供 80 多個國家使用中國監視技術。

<sup>3</sup> 2023 年由德國、荷蘭合作發行，由張嘉玲導演的紀錄片 *Total Trust*《全面監視》，便展現了中國利用智能科技打造大數據監控而全天候監控的恐怖日常。

<sup>4</sup> 根據 2024 年的一份統計，已經有 6,000 個科技企業在 BRO 的入口網站註冊，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投入科技產業，至少有 16 個國家簽訂的數位絲路的協議書。中國科技公司已經建造了 116 個智慧城市，其中有 70 個國家是 BRI 的夥伴國家。除了提供無線網路、5G 網絡、建造智慧城市、安全城市之外，華為還協助當地政府建造監視系統 (ICDS, 2024)。

然而，數位時代的「安全」、「領土」、「人口」這三個概念，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數位時代造成了領土的無邊界；安全不再是國境邊界的檢查，而是透過物聯網的數據資料以及數位監控，進行全面滲透的管理。國家要管理的人口不再是國境之內的人民，也包括了國境之外的人民，更將人口數位化，而成為可以管理的數據。國家的權力透過資本的連結以及法律的例外狀態，而在地緣政治之下無限擴張，更造成人權的無法保障。

對我而言，更饒富趣味的問題則是，為何二十一世紀會再度高調出現「天下論述」？二十一世紀的天下布局，如何實踐了中國的天下構想？「天下」這個詞彙所牽動的發言視角與物質環境，發生了什麼改變？當代的「天下」圖景要透過什麼樣的基礎建設來支撐？如何透過論述構成以及物質實踐而達成？更具體的說，什麼樣的自我想像，會構築出二十一世紀的「天下」視野？這個「天下」的競爭對象在何處？當代中國崛起的天下擔當，「天下一家」、「和諧共生」，是要透過中國的「一帶一路」或「數位絲路」來完成嗎？或者，其他的政治角色要加入這個「天下」的競逐，如目前美國所參與的各種部署？

這些問題，都是導引我繼續進行研究的好奇，也是動機。

這些迫切的問題，顯然不是一人之力所能夠應付，也不是單一地區單一領域的學者可以回應。從 2018 年開始，我便邀請跨國學者參與合作計畫，從「遷移、物流、不平等公民」，到「晶片時代與數位治理」，參與的學者來自韓國、香港、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度、澳洲、德國、義大利、波蘭，包括資深學者，以及年輕學者與研究生。

回應時代向我們展現的迫切問題，是人文學者思考的動機，也是學術研究的起點。走過這些曲折但持續的路徑，將會展開了無法預測的動態知識地圖。